

西周以前，由于我国最初的文化发源地在黄河的支流渭河、洛水、汾河附近，地势为高原，故多种黍稷，黍即今之北方黄米，稷即今之高粱，其具有高地耐旱性，在当时广为种植。春秋至战国，居住地的迁居，农作物渐由黍稷变为粟麦，最后，逐渐演化为稻米。

井田制跟随封建制而来，中国封建制即是“封土建国”之意，由于西周时期有华夏与游牧之分，虽都是中国人，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，华夏是有固定居住地的农民。故当时的封建时期也称为“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”。在西周初期，封建小城邦无法与四周王朝匹敌，认其为主，奉为天子。同时，由于周边游牧部落侵扰，封建势力遂将游牧人驱逐至塞外或山上。封建制下的井田是在小城圈内，即是一种小规模农业经济。封建主将土地分给佃农，公平无偏，农民亦无兼并，故无贫富之分。当时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，即是依赖井田制而获取公田之利。当时封建主派官吏教导农民种植，故有“私田收成不足怪官吏，公田收成不足怪人民”的说法。后来由于赋税制度的改变，土地不再有公私之分，统一征收十分之一的税，井田制遂完全被破坏。

农业生产由黍稷到稻麦，封建瓦解，工商业逐渐在战国时期发展繁盛起来。春秋时期虽有商业，但当时的工商人员皆由政府所养，世袭传统，进而导致其生产有限。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商业大都市，如临淄、邯郸等。战国时期，各个国家也有钱币发行，韩赵微的布币，燕齐的刀币，楚国的鬼脸钱，秦国则是之后才开始发行钱币。从春秋到战国，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，政治、学术、经济都有大变化。特别是经济，由贵族御用工商业发展到农工商兵的自由业，像煮盐、采铁、纺织、水利、捕鱼、伐木等新经济，使战国时期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。但是，贫富之分也由此而来。

秦朝统一六国之后，郡县制建立。秦代农工商三业并举，修水利、统一度量衡与货币，统一车轨文字，重视工商业投资，儒法并用，发展生产。当时主要的工业如冶铁、冶铜、纺织、造船、建筑等都有所发展。同时各地互通有无，贸易交换，商业开始繁盛。对于农业，土地开始兼并，或通过强力、或通过钱币，导致贫富差距，富者雇佣佃户，交租种田维生。一统六国，百废待兴，筑长城、修陵墓、建阿房、守五岭等役使农民戍卒的行为使民力枯竭，赋税日重，难逃灭亡更迭。

西汉币制变迁：西汉以一寸立方黄金为一斤，十万钱为一金，12铢钱币为半两。西汉初期，由于秦币太重，汉文帝时期曾铸四铢钱，且此时放任铸私币，故导致钱币质量下降（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），商品价格上涨，社会商业动荡。汉武帝时期铸造五铢钱，通行全国，以统一货币。此时十个五铢钱为一两，稳定的货币市值，带来商业活动的稳定。当时黄金虽未明文说明是通行货币，但仍有支付使用的地方。汉代五铢钱较后代同等货币购买力为高，当时十金之家足成首富。武帝往后一百年之西汉，共铸币280亿枚，使国家财政安定富实。根据史料统计，当时官员的俸禄为：三公（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丞相）6万钱/月，御史大夫4万钱/月。

役赋类别		服役内容	代役价
更赋	更卒	23 岁至 50 岁男丁在郡县或京师服役一个月	纳钱 2000，由政府雇人服役
	正卒	23 岁至 50 岁男丁到本郡服兵役一年	每月 2000 钱
	戍卒	23 岁至 50 岁男丁一生必须去边地屯戍一年	缴纳 24000 文代役
	戍边	男子每年须戍边三日	纳钱 300 代役
力役		无论男女，要为国家和王室服役，建城修墓，治河水利，运粮赴边，为期数天或数年	富豪多有逃避，多由平民负担
田租		高祖至武帝税负不同，有十税一，十五税一，三十税一，景帝二年的三十税一到西汉末年未变	
漕税		按田亩多寡缴纳禾秆，供皇帝和军队喂养牲口	知乎 @如是我问

西汉役赋与田租：西汉的田租很轻，但是一家人算上算赋和口赋，负担就相当重。由此也造成工商业不景气，消费能力地下。这更让一部分缴不起的人自卖身与有钱人，为奴隶做苦工，主人奴隶缴纳算赋。当时商人做生意要雇佣员工，奴隶可穿绸缎替主人办事，与主人共分利得。

西汉的经济政策：汉高祖对商人施以重税，不得衣丝乘车。孝惠帝吕后时期市井商人不得为宦。武帝更是轻视商人，以为商人剥削人民利益，且对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起不到好的效果。文景时期，新商人阶级崛起，社会奢侈恶习风行，晃错提倡重农轻商，但仍改变不了贫富差距的拉大，仕宦之路被财富人所垄断。武帝时期，实行均输制，以控制商品运销，平抑物价和增加国库收入。同时向商人征收重税，算缗钱的税项便是武帝重农轻商政策下的产物，主要内容是向商人和高利贷征收财产税，按所得或商品价值征收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三的税。同时还有算商车的税，即向有车船拉人者征税。为了避免逃税，政府还实行告缗令，鼓励百姓揭发不交税者。这一举措打击了大商人，增加国库收入，同时也巩固了中央集权。

西汉的盐铁业发展：因盐铁自战国起已经成为日常必需品，大盐商和大铁商生意获利极丰。汉初民间可私人铸币、冶铁、煮盐，但由于受商贾剥削，民间生活更为艰苦。虽盐铁国营专卖素已有之，但是直到汉武帝才正式定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，从盐铁中抽的得重税。武帝在28郡设盐官，40郡设铁官，由大农丞统管。盐铁专卖增加了国库收入，抑制了豪强的攫取暴利，因而也招致豪强富商的对反对。桑弘羊就主张开放经济，但汉昭帝仍坚持盐铁专卖，直到章帝才废除盐铁官营而改为征税。至今2000多年来，大体上说，盐业均由政府管制，但制铁后来放开了管制。虽说平准、均输政策是为方便人民，但是这两种政策看起来是对人民有利，但是奸商与官府勾结，生发弊端。对于西汉时期的鬻爵政策原是秦孝公商鞅制定，在汉朝，朝廷卖爵以充盈国库，百姓买爵以免徭役

西汉时期的经济思想已经有重农轻商和自由主义的出现，一方是由晁错、董仲舒、贾谊为代表，一方是一司马迁为代表。两种思想引导经济政策的不断变更和适时调整，有利于国家稳定。汉武帝雄才大略，但其在平民社会中造成了一种骄奢纵恣的风气

王莽，少年孤贫，恭俭勤谨，38岁擢升为大司马，辅政哀帝。其政治理想开始显现。哀帝即位，即颁布“田宅奴婢限列”的规定以防止奢靡之风。哀帝无此大略，皆王莽辅政结果也。后经政变，王莽篡汉，新朝开始。

西汉末年，由于自昭、宣帝以来的休养生息，放任经济发展，导致贫富悬殊，公卿仕宦家族财富万千，骄奢淫逸，强者拥田千计，弱者无立锥之地。王莽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酝酿，及建立新朝即针对贫富悬殊，行均田费奴婢。但是是一种经济情况，必有其自然生长之过程，富者不无故而富，贫者不无故而贫，奴隶也有其生活之道，豪民亦非皆愚，此乃社会阶层之总体发展过程。故政令一出，并未始终实行，后即终止。

除此之外，王莽新朝在20年间更改币制四次，虽说豪民兼并之可恨，贫富不均之可忧，但欲消弭弊端，亦非更改币制可解决。更改币制虽可以使富民失去兼并之资，但此改革涉民生甚广，影响极大。币制改革扰民误事，遂不成功。

王莽税制方面行五均六筦之制，“五均”是对工商业征收工商税，利用收税所得官营除贷，使高利贷者无所牟利。“六筦”是指盐、铁、酒、名山大泽、钱币铜冶及除贷均由国营，不准民间插手。王莽的五均六筦之制是根据传统文化经济思想而来，是为了“齐众庶，抑兼并”

地皇二年，群言设计五均六筦之制的大臣鲁匡使工商穷困，宜杀之慰人心。王莽遂将鲁匡免职，地皇三年取消原来一切不利于民的政策，包括井田、奴婢、五均六筦之制。而此时光武兄弟起兵之势难抵，新朝灭亡。

古代经济管理水平不及现代完善便利，经济思想不如现代多样繁杂，王莽新朝制度旨在为民，但却不知何为利，何力为利。均贫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结果万不可当作目的，经济以稳为要，改革当循序渐进，不劳民扰民。

东汉光武帝即位之后，为了稳固战乱后的社会秩序，宣布废除新朝的政策制度，以休养生息达到汉室中兴。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土地问题，为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便于征收赋税，光武实行“度田”，清查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数、年岁。对于反对者采取让步政策，迁徙至他地，给予田宅安排，已达到平息纷争。

东汉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：一是田租收入，二是盐铁税收，三是卖官鬻爵收入。东汉早期田租为十分之一，后因屯田政策的成功，田租降为三分之一。东汉针对三等肥瘠不同的土地分别收租，并且在租的基础上附加其他赋税，即田赋附加，由此而始。至于盐铁征税，东汉早期实行过短期的盐铁专卖，和帝章和二年，废除专卖，改为课税。东汉时期常有自然灾害，粮产不丰，政府禁止卖酒，也不征税。卖官鬻爵东汉较之于西汉更甚，桓灵二帝时期，宦官弄权，政治更为败坏。

东汉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军费和官员俸禄，其他还有交通运输、农田水利、建校教育、赈灾抚恤等。东汉对南匈奴、西域、西羌、凉州、并州用兵，军费开支较大，人民负担加重。东汉官员冗吏较多，卖官鬻爵成风，官员舞弊猖獗，使国库无钱出得。东汉相当注重教育，当时学校如林，所费颇多。西汉时期王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有所划分，但也有互相挪用的情形，西汉武帝曾挪用王室收以作战费。但东汉则往往挪用国帑以益王室。

由于东汉对外用兵颇多，兵费极大，为坚持持久作战，采用屯田之策，其屯田政策相当成功。两汉时期奴婢众多，工作范围广且待遇颇丰，当时的奴婢“文化”相当丰富，但此种奴婢则与罗马的奴隶差别甚大。

东汉后期，豪强世族、贵族外戚或者是富商大地主皆有独立的庄园，并称霸一方。庄园类似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集团，有家规刑法，有防御守卫。庄园内的地主与佃农常是同姓或同宗，但事实上贫富差距悬殊，这也形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。

东汉各行各业也得到了普遍发展。重视农业水利，使粮食增产，发展林业，注重树木的经济价值。冶铁、煮盐、漆器、铸铜、造船、制车、陶瓷等技术较前代进步。东北与西北的畜牧业兴盛，蚕桑织帛开始南移，四川、江浙地区发展兴盛。此外，汉代的酿酒和制糖业得到发展普及。

第一章：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

第二章：上古时期的井田制

第三章：封建时期的工商业（公元前770——公元前221）

第四章：秦代经济（公元前221——公元前207）

第五章：西汉时期经济（公元前206——公元9）

《中国经济史》钱穆

高二13杨远航

第六章：新朝时期的经济（公元9——23）

第七章：东汉时期经济

第八章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（公元220——589）

第九章：隋代经济（公元581——618）

第十章：唐代经济（唐公元618——907，五代十国公元907——979）

第十一章：宋元时期经济（公元960——1368）

第十二章：明清时期经济（公元1368——1912）

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：曹操以农事为急务，听取羽林监颍川枣祗的屯田建议，委任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募民于许下。同时在州郡遍置田官，贮粮于当地，以便征伐四方时食用。赤壁失败之后，曹操致力于内部经营，西进关中、平定陇右，中原得以统一，此亦得靠于屯田政策。后邓艾出创更为出色得屯田政策，使得10万兵士五年连战仍有粮吃。蜀、吴纷纷效仿。蜀地物产丰富，早期并无屯田之意，后期诸葛亮北伐才开始逐渐扩大屯田规模，直到姜维继诸葛亮遗志而刘禅投降终止。

西晋的土地制度：三国虽为乱世，但曹操、诸葛亮以及司马懿仍记得秦汉制度，天下平定后便思改制。西晋时期，屯田都尉取消，令县长主事，田还于民，使耕者有其田。当时主要有两个制度：品官占田制和户调制。品官占田即是按照官员品级占有不同面积的田地，各级官员可用占田荫其亲属，多者九族，少则三世。后来大官员占田数量甚多。户调制是由西晋政府将土地分配给农民，并规定一个确定的土地占有数，男丁占70亩，女丁占30亩，其中男丁课税50亩，女丁课税20亩，课税达十分之七。西晋户调制不出30年，天下大乱，故有其制但无其实，可能并未推行此制。

魏晋南北朝各期屯田情况：西晋借军屯灭吴。西晋时期农屯废除，由县长主事，但仍在军事战地实行军屯。东晋103载，亦多有屯田之地，此时期的屯田主要是因为局部战事以解决军粮问题。南朝期间，南宋、南齐、南梁、南陈皆有实行过屯田政策，而屯田政策又大多是战争时期粮食供给的主要策略。北朝时期北魏近200年执政期间，无论对军屯还是民屯都十分重视，成绩亦较南朝为佳。除北魏，北齐、北周亦采取屯田政策，屯田政策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军事胜败。

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：东晋赋役繁苛，税种较多，东晋农民除田租还有户调，田租普遍十取其七，加上户调的沉重，不少人故意弄残身体或削发为僧以避徭役，鳏寡不敢娶妻。此外中国田宅房契税、交易税均始于东晋。南朝宋武文二帝轻赋役。武帝刘裕掌握政权十余年，整顿赋役，减轻人民负担，以纾民困，为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武帝之子刘义符登基两年被废，三子刘义隆文帝即位，掌政三十余年，继承父志，致力农桑，奖励力田，这一段时期是南朝史上赋役最轻的一段时期。可是，文帝被太子所杀之后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元嘉草草废。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，以后诸帝，乏善可陈，到了末年，君主荒淫，赋役无度，无善政可言。南梁武帝废除繁重杂调，体恤民困，诚可赞矣，但晚年糊涂用事，为侯景所害。五胡十六国田租仍然是八二分乃至六四分，政前民后。到北魏时，政治逐渐走向正轨，处理赋役亦较南朝有办法。

中国经魏晋南北朝400余年来的分崩动乱，及隋朝复告统一。隋朝历时38年，国祚虽短，但人口繁育之盛和仓廩府库之足为汉代以来第一，且开丰衣足食之世。原因为何，当如实分析。第一，隋文帝轻徭薄赋为富足之结果，富足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政令的统一与社会阶级的消融。中国古代之贵族封建，以及魏晋以来的门第特权，至隋朝全部消除，整个社会处于同一平等地位，而属于同一政权管辖之下，致使下层之负担尚甚轻，而上层收入甚足。第二，隋文帝生活节俭，勤于吏治。隋代末年，天下储粮达五六十万。

隋代土地分配按官民等级有所不同，亦有君王特赐功臣者。隋代的赋税可分为租调、徭役和杂税三部分。租调和徭役较为合理，杂税方面无食盐税，亦免酒税，但人民需对王室纳贡。隋代炀帝时期，大兴土木，连年征战，于是加重劳役，男丁不足，征用妇女，民怨沸腾。隋代的重要经济举措。隋代发展水利漕运，使南北畅通运输。隋文帝始建义仓和社仓，又修广通渠，方便粮食在潼关内外转运。惜文帝于荒年时，民多饥乏，竟不许赈济，诚可叹息。隋代建筑和交通运输发达。桥梁、宫殿等巧夺天工，造船工业先进，另外隋炀帝又开辟多条驰道，凿通太行，工程浩大。至于货币，文帝初年，使用五铢钱，严禁私铸，市值相对稳定。隋炀帝大兴土木，广开河渠，三征高丽，开支巨大，造成滥发货币，引起贬值，且私币滥行，使得经济崩溃。军费巨大，劳役甚重，民生凋敝，财政不稳，社会动荡

唐代20帝，290年。太宗皇帝勤于朝政，但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，实不比隋炀帝为佳，盖因隋末群雄并起，拥众有50万，也有50人的，天下大乱，民间已极颓废。贞观人口不足300万户，到高宗永徽三年才增加到380万户，而隋代开皇年间已有870万户，直到玄宗天宝十三年，才有961万9000户，进入唐代极盛时期，始足与隋代相比。玄宗时期警惕隋亡之因，不敢骄纵，以至富庶，但仍造成天宝之乱，与隋炀帝时代颇为相似。

唐代不收一切商业赋税，为前代所未有。唐初并无榷盐之税，100年以后玄宗时代才开始收茶税。唐初不允许私人酿酒，代宗广德年间才始有榷酒之税。唐代任由人民富庶，人人分田，平均地权

租庸调制：唐高祖武德七年创立租庸调制，此制度乃由北魏均田制演变而来。此制规定：凡男男女刚出生称黄，4岁称小，16岁称中，21岁称丁，60岁称老，凡丁年18岁以上者授田一顷。其中80亩为口分田，年老还给官府，20亩为永业田。永业田可传给子孙，政府不再收回，即使子孙犯法亦不追回。规定每亩种桑50棵，榆、枣树各10株以上，须在种田三年内种毕，如不宜种此种树，另择宜树。规定百姓身死家贫无以供养，可售卖永业田。除此外，其他涉及买卖田地事项，均须呈报官府，取得文牒。凡经营工商业，则永业田，口分田减半。宗教人士给田另有规定，道士30亩，女冠20亩，僧30亩，尼20亩。政府官员授永业田：亲王100顷，正一品官60顷，都主及从一品50顷，正二品40顷，从二品35顷等。唐代按照每丁分配土地缴租，每丁每岁出粟二石，谓之租，每丁每岁输绫、绢、绵各两丈，如用布代替，则加五分之一，谓之调。同时规定每丁一岁做工35天，可免调；做工50天，可免租和调，至于正式的庸，每丁每岁20天，不役者每日以绢三尺代替。以上即为唐代租庸调制。以土地产量计算，其租为四分之一，可说是极轻。粟米、布帛和力役之征，并非胡乱拼凑，实为孟子之理想。以为为主的唐代税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中最好的，论轻重薄赋，亦当唐代第一。其优点概括为三：一者轻徭薄赋；二者税目分明；三者为民制产。

租庸调制没落：首先，按户口分田，当制度行之数年，户口调查便生问题，分田亦有困难。其次，豪强兼并现象仍存，已失当初平均田地之原意。

两税制成立经过：凡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之改变，均非一蹴而就，事先必经过一番酝酿。唐代自安史之乱的连年战祸，人口剧减，百废待兴，国家急需款孔急。唐德宗建中元年，宰相杨炎洞察弊端，遂奏请两税制。两税制以田不认人，以亩定税，其实为资本税，有多少资本收多少税，原则是量出为入，即以唐代政府用多少钱而预定收多少税，并非每年编制预算，而是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为标准。

两税制奖励人走向商业社会路线，注重资产，对农业社会有所损害，使人恐惧于安居置业。农业社会以量入为出，商业社会则是量出为入，且以钱币纳税使农民吃亏，商人占便宜，政府急于征收，只重视收税总额，而不思公平分配。

盐政和漕运

唐代高祖武德四年以前，主要流通之货币为隋代五铢钱及其他古钱，四年才开始铸造“开元通宝”，由于“开元通宝”不是开元年间铸造，故可称为“开通元宝”。直到五代，仍实行开元通宝，后代亦将此钱作为标准，直到清代因袭不变。

中国对外交通在汉代已经开始，从三国到南北朝，中西交通一直没有停过，至于中西交通正式像样的开始，则是隋唐时期。唐代已有很多外国人来华经商，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有二：一则西北陆路，二为东南海路。

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经济，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，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。中国东汉以后的门第社会传承了1000年以上，至唐安史之乱后而止。宋代开始已无门第社会，却出现了庄田，庄田的主人为庄主，为庄主种田的是庄客。

宋代政治经济思想的争论和南北之争是时代的主旋律。责怪王安石顽固或者是司马光不死改进，都是不妥的，故不应抱有成见，同样尊敬他们才是。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出现问题而无妥帖的解决办法时，就会有各种思想产生。王安石的方田制和免役法由于没有表现出良好的成绩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思想。中国人讲道理不外人情，重义而轻利。有时一种很好的理论或政策，可能走上很坏的路，不幸，宋代的限田政策亦意外地找来了坏的结果。

宋代时，河北、察哈尔、绥远、热河及辽宁一带的北方地区为辽国所占。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才是宋国疆域。金国为游牧民族，全国皆兵。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后，初不知田地之功用，将田地变成牧场以养牛马。后因耶律楚材劝元政府不可将田地变为牧场，田地可收租税，可为国库主要收入来源，于是，元世祖同一中国后开始劝农。金元时代大力呼吁农业，正说明了金、元时代之农业已濒临崩溃的边缘。

元代在宋代“乡约”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农社制度，这是一种农村自治。元代的农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义的制度。此制度有利于中国农村发展。

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有井田、限田、王田、占田及均田等，但自唐代租庸调制以后，改行两税制，此下便没有土地制度，一直下来到清代都可说大体上是实行两税制。今天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和大陆地区的土地政策，可以说是民国以后，中国又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着重的土地问题上来。明代的税制其实是唐代两税制度的延续，没有什么土地政策，只能谈谈租税。明代有“黄册”和“鱼鳞册”两种册籍并非制度。中国有户口碑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

明代特别优待读书人。明代的科学分为“生员”和“进士”两级，“生员”包含秀才和举人，可以不受罚。

明代中叶为解除繁苛赋役，遂奏请实行丁粮合一的一条鞭法，嘉靖十年，大臣傅汉臣提出，但嘉靖时并未实际实行，正式实行则是在隆庆四年，此制至万历九年全面实行于中国。综合来看，一般人认为一条鞭法是简单的好办法，但反对者甚多，南方人赞成而北方人发对。由于南北经济状况不同，有时当因地制宜，不宜用同一种方法制度实行于全国。

总的来说，乡官、生员和吏胥是明末三大病，明清的吏胥问题最难解决。

宋代以后关于赋税方面的事情，已不是制度问题，只是人事手段问题而已。满清入主中国，顺治十八年时，下诏一切丁徭田租依照明代万历年人口计算，康熙五十年，其人口不及万历时之半数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明代以明神宗万历时期最好，当时社会安宁，人口繁盛，诸凡古代的寺庙大钟、瓷器古玩，很多都是万历年间制造，但万历也是衰坏的开始。清代最盛当是高宗乾隆朝，但也正如万历一般，也是清代颓败的开始。乾隆时代，国家税收几乎全部充作军费，准回之役耗费3300万两，缅甸之役耗费900余万两，两次金川之役，共耗费9000余万两，尚有廓尔喀之役和台湾之役攻耗费一亿5000万两之上。乾隆武功鼎盛，但终于成为强弩之末，遂使清代步入衰颓之境。

中国西汉末年，人口2000万，明代万历年间为2106万，到了清代初年，由于杀戮多，人口已不足2000万，康熙五十年时人口增至2462万，到乾隆十四年，全国人口达1亿7749万，差不多有两亿人口，30年间，人口增长了7倍，乾隆四十八年，人口有两亿8403万，将近3亿，乾隆五十八年人口为3亿746万，嘉庆十七年，已有3亿6169万人口，渐渐接近4亿，民国以来，国家没有大的战乱，人口很快增加到了5亿。